

金冲及
文从

金冲及

著

联合与斗争

——毛泽东、蒋介石
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金冲及文丛



联合与斗争

——毛泽东、蒋介石
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

金冲及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 / 金冲及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3

(金冲及文丛)

ISBN 978-7-108-06239-0

I. ①联… II. ①金… III. ①国共合作—中国—1936—1946
IV. ① K2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7678 号

责任编辑 马 翀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 数 198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前 言	1
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特点	3
二、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初阶段	9
三、磨擦怎样进入高潮	47
四、相对缓和的局面	123
五、局势再度恶化	153
六、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173
七、结语	205
附录	213
（一）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	215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16
2.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由来	226
3. 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235
4.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249

(二)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	259
1. “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	259
2.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和蒋介石的犹豫摇摆	265
3. 转折的开始	272
4. 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280
(三)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289
1.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290
2. 瓦窑堡会议	295
3. 东征和晋西会议	304
4. 对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反应	316
5.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323
6. 西安事变前后	335

征引文献	353
一、报刊征引文献	353
二、图书等征引文献	354
三、海外征引文献	363

后记	371
----	-----

前 言

1937年至1945年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构成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局。这八年，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取得抗击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成为民族复兴的重大枢纽。这八年，走过的又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危机迭出、起伏不定的崎岖道路。它给后人留下无数值得深思的话题。

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国共合作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如果当时没有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难形成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由于大敌当前，尽管双方仍存在种种矛盾，但在抗战之初有过一段比较好的合作时期。随着战局的推移，磨擦不幸地发生了，上升了，有时甚至仿佛已到破裂的边缘。但又一再峰回路转，出现相对缓和，把合作保持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始终没有破裂。

这样令人惊心动魄、曲折而复杂的局面，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也是对双方统帅部品格、智慧和驾驭复杂局势能力的严峻考验。

蒋介石在战争期间，虽然有时积极有时消极，但始终坚持抗战，没有屈服，和汪精卫截然不同。这是值得肯定的，

也是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合作的基础。但他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总是力图限制以致伺机消灭共产党，这是磨擦产生和上升的根由。但由于国内和国际诸多因素的制约，他也有所顾忌，不敢把事做绝，往往留有余地，碰了钉子就暂时歇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发动全面内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以沉着冷静的态度，从容应对起伏不定的种种风浪。他们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痛苦教训，正确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这个异常复杂而又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既不像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王明主张的那样，“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犯右的错误；又不像十年内战时期三次“左”倾错误那样，“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在斗争中，又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恰当做法，斗而不破，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不断取得新的成功，在处理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的历史 and 先人的智慧，至今依然可以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特点

要谈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首先必须从当时国共关系全局的实际情况出发。

如果把国共这次合作同十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较，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是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时形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大革命，主要矛头指向受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北伐战争。那时，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很脆弱；十多年的军阀统治和混战在国内极端不得人心，军阀阵营内部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所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开始，几乎是长驱直入，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占领上海、南京后，蒋介石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不再需要共产党这个合作伙伴，便翻过脸来实行“清共”。而全民族抗战时不同了。一个民族敌人深入中国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压倒一切的决定作用。日本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野心又那么大，

要灭亡中国，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现实生活使大家看到：侵略军铁蹄所到的地方，处处是惨绝人寰的屠杀、焚烧和劫掠。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关头，对国共两党都是如此。只有合作抗日，才能维护整个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谁主张并实行团结抗日，谁就能得到人心；相反，便受到人民反对。这决定了合作的长期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尽管双方的关系有过大起大落，合作却始终保持着，没有破裂。

第二，它是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死搏斗后形成的。国民党在1927年发动突然政变，昔日的盟友一下成为凶残的刽子手。中国共产党那时还是年轻的党，成立只有五六年时间，以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只是初步做了一些，对待那些善用政治手腕的官僚、政客和新军阀几乎没有经验，对理论和中国国情的了解还很不够，对国共关系突然全面破裂无论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缺乏准备。据中共六大不完整的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杀害的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两万六千多人。党的许多优秀领导人如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张太雷、方志敏、邓中夏、陈乔年等先后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之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流的血太多太多了。1927年和1934年，中国共产党两次被逼到毁灭边缘。这种

伤痕是很难淡忘的。而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坚持抗战，在抗战初期还想利用中共领导的军队一起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总想限制、削弱以致伺机消灭共产党。有过惨痛教训的共产党对此不能不时刻抱有戒备。这又不可避免地给合作带来极大的复杂性，有时甚至发展为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首先是上述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的：前一个特点决定了两党合作抗日的长期性，后一个特点又造成合作的复杂性。两者的相互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直线式地发展，而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动而起伏不定：有时（特别是抗战初期）合作得比较好；以后也有过相互关系比较和缓，甚至出现某些好转；而有时（特别在皖南事变前后）却出现狂风恶浪式的严重危机，仿佛已走到破裂的边缘。但基本局面没有改变：合作中一直存在着斗争，而斗争不管多么剧烈，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也始终没有破裂。

第三，它是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情况下合作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只有广东一省并不巩固的政权和不多的军队；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虽有很大影响，但没有掌握政权，又几乎没有军队。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已“有着全国性的政权和强大的军事力

量，并且有十年一党专政的统治”；^[1]共产党也有了自己领导的军队和政权，而且有很强的战斗力。国共合作首先从双方军队的合作抗日开始，这是合作的主要内容。但国民党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而且始终把限制、削弱以致伺机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作为它最关切的问题。共产党如果失去自己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就只能处在听人宰割、束手待毙的地位，这是惨痛的历史经验证明了的，是一刻也不能遗忘的。因此，军队和政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成为贯穿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矛盾的焦点。

第四，它是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逐步形成的新历史条件下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资本主义世界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严重社会危机中摆脱出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以很大力量对付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在远东占有最大权益的英、日、美三国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态度大体上是一致的：最初抱着敌视的态度，以后又尽力扩大国共矛盾，把蒋介石拉过去，支持他的反共活动。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情况起了很大变化。从国际范围来说：嚣张不可一世的以德、日、意为轴心的法西斯势力迅速崛起，以挑起大规模战争（特别是“闪电战”）的手段，企图称霸世界，

[1] 任弼时著：《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对人类社会构成最严重的威胁。这样，便形成反法西斯阵线与法西斯阵线的对立。在远东，不仅苏联，就是美、英也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以牵制更多的日本兵力，不赞成国共分裂。这对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团结抗日是有利的。但这两大对立阵线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中间风云变幻，变化很多也很快，有时甚至使人觉得似乎难以捉摸。这又增加了国内政治局势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应对这样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而又异常复杂的局面，恰当地处理好国共合作中联合与斗争的关系，确实极为不易。到抗战的中后期，尤其如此。对作为国共双方领导人的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既有战略视野和政治智慧的较量，又有意志和勇气的考验。而双方领导人的决断，对局势的发展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准备着重考察毛泽东、蒋介石怎样应对抗战中的国共关系。当然，也不能不涉及当时国共关系中的某些一般情况和双方其他领导人的活动。

谈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先讲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巨大震撼，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变化和西安事变后两党如何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合作，才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但我写过《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

日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几篇论文。本书就从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时说起，而把那三篇文章作为附录。

二、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初阶段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在这场战争中，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尤其是抗战初期，双方的合作比较好。

中国共产党对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鲜明和坚决。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7月1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2]1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要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电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2] 毛泽东、朱德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1937年7月11日。

国防。”^[1]同一天，朱德为红军将士题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本出中国，何以为人！”^[2]16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等：在南京政府“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旅编为团”。^[3]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卢沟桥事变是否已肯定地成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而不是局部性的事件，作出明确的判断：“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卢沟桥事件是非偶然的，过此界限，非抗战不可。”^[4]这个判断极其重要，是接着所采取一系列行动部署的依据。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一共开了四天。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

[1]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2] 朱德著：《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3] 毛泽东、朱德致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电，1937年7月16日。

[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9日。

形势，指出这场战争必将是持久而艰苦的，必须做到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抗战。这就要求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改善劳动大众的生活。如果不进行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不把民众充分发动起来，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将无法取得胜利。动员全民奋起的“全面抗战”还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那场争论，就是由此开始的。洛川会议本着这种精神，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一个新的问题提到面前：红军对日军应该怎样作战？这时，红军将要遇到和交手的对象和以往不同，是由精良的现代武器装备起来并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日本侵略军，但他们的兵力终究有限，又受到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军事报告中，及时地根据日军的特点，指出红军作战方针应该确定为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并说明：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1]这是红军作战方针的重大改变，是适应抗日战争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克敌制胜的唯一正确方法。对这个问题，毛泽东

[1]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军事报告，1937年8月22日。

比谁都认识得更早更清楚。

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它在8月25日正式发布命令：“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八路军主力在8月、9月间由朱德、彭德怀率领，从陕西三原地区和富平县出发，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八路军在国难深重的关头，毅然开赴山西前线同日本侵略军作战，是何等可敬。可笑的是，在六年以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1943年9月13日通过一份秘书处《关于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之决议，其中说：“此种阴谋，具见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出发晋北时，毛泽东对干部之训话所谓‘中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七分发展、二分对国民党应付，其余一分为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